

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死亡的著作
俄罗斯 1996 年排行榜第一，首版畅销五十万册
中国大陆独家版权

面对死亡

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

俄罗斯 А·П·拉夫林 著

中国·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 译

有这样一个心理猜谜游戏：
问：“碰到一堵高墙，你怎么办？”
(指无论左右上下，目力所及，全是
墙。)有人不解底蕴，答案从越墙
而过到碰墙穿壁。问者最后宣布：
这问题暗含测试，看人对死亡
的态度：那高墙乃是象征死亡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ПЕРЕД СМЕРТЬЮ

面对死亡

俄罗斯 А·П·拉夫林 著
中国·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1997年9月

《面对死亡》编译委员会

(以下均以姓名笔划为序)

出版策划:孙光成 刘立众 王春蓉

主 编:孙光成

编 委:王朝荣 本德昌 田辛耕 孙肇伦 李世雄
李大成 李秉严 周孟璞 赵 芝 贺之强
耿大华 袁大发 徐宗英 黄开敬 焦广田
舒启全 曾庆邨 蒲元明 雷仲明 熊 川

译 校 者:王 焱 刘彦文 孙光成 杨叔予 李志强
李大成 何爱华 汪 萍 张喜成 张如颜
陈桂英 陈历蓉 尚之年 周文英 胥 兵
徐天虹 唐伯讷 黄柱宇 曹 经 舒启全
童 超 戴定鸿

面对死亡（代序）

有这样一个心理猜谜游戏：有人问你：“路上碰到一堵高墙，你将怎么办？”（这里指的是：无论左右上下，视力所及，全是墙面。）有些人不了解这个问题的底蕴，便会去考虑各种各样的行动方案：从试图越墙而过，到用脑袋碰穿墙壁。提问者看尽他们的窘相后，才郑重宣布：这个问题暗含着一种测试，看人对死亡的态度如何；那高墙乃是象征死亡。

死亡常常伴随我们左右，我们与它形同朋友，邀它同桌共餐，隔墙而眠；人们至今将它当作一位放肆无礼的门人。它犹如不速之客，由于我们知道它“位高职尊”，而不得不接纳忍受。只有少数人（科学家、哲学家）试图对它下逐客令，尽管这种努力眼下徒劳无益。大多数人对将来不可避免的死亡听天由命，不想去硬撞高墙，而转头回到顺从死亡的传统。

然而，死亡并非机体简单地停止生命活动，它同生命本身一样，既神秘，又奇异。或许我们对待死亡并不总是公正，因为我们对它早有先入之见，也许值得摈弃陈规，与死亡建立更为密切的交往——自然不必达到互相爱慕的程度。到那时候——还会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呢！——我们诚惶诚恐渴求了解的底蕴，会忽然露出一些端倪。我

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常常在身上剜出一些伤口，因为那时的好奇心超过了疼痛。

我写这部关于死亡的书，几乎是一个偶然产生的念头。有一次，我想在一本书中收集著名诗人的遗作。我只想收集我确知的，诗人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诗。后来我想，也许这样更好：不收集最后诗作，而收集临终遗言，而且不限于诗人，也包括许多名人的遗言。或许，他们在弥留之际流露出的某种东西，对我们健在的人也是重要的；或许，我们还来得及哪怕用眼角瞥见他们走向通往“某物”的、帘幕摇曳的小窗。存在主义者的看法不无道理：死亡的时刻，有生命危险的时刻，是一个人表现出真实的“我”的时刻，是最大限度认清自我和整个世界的时刻。

但是，我在搜寻临死者的遗言时，发现这些话脱离了临死的环境就常常令人费解。而假如不了解一个人生前的遭遇，就往往难于理解他们的死亡。……结果，我干得越多，展现在我面前的新课题就越多。我终于产生了一个想法——编撰一本反映死亡的全景式的书——一种百科全书。不过我并不想成为一部枯燥的纯理论著作的作者。生活是丰富多彩的：有欢笑，也有眼泪；有香槟加菠萝，也有背上缀着号码的囚衣；有风琴的乐声，也有圆盘锯的尖鸣……那么，死亡何以比生活更糟？既然死亡能把生活中这一切悉数夺走，难道它就没有包含生活的全部内容？这就是说，这本描写死亡问题的书，应当写得同生活一样丰富多彩——我是这么决定的。理论应当与实际并重，忧伤应当与笑共存，恨应当与爱交织……从严格的物质规律直到市井趣闻，全在本书范围之内。但愿每一位读者都在这本书中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。

我不怕别人指责我搞折中，死亡百科的折中。一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一些人当作侦探小说读，另一些人当作家庭性作品读，还有一些人则视其为最深奥的哲学著作。加布里埃·马尔克斯将此书称为古典肥皂剧……或许只有少数人能同时完整地这部作品，理解它的所有层面。

我希望我这本书也能拥有那些练达的读者。无论如何，书中的

一些章节既能满足喜欢寻求刺激的人，也能满足对真理孜孜以求的人。对于统计准确数字和日期的爱好者，本书也大有裨益。不过，本书要特别奉献给那些具有全面思维能力的人。他们能在大量的事实、事件和现象中看到规律性，能把这些看似乱七八糟的大量事物，融汇成井井有条、充满自身特有和谐和合乎逻辑的系统。

读者将会看到，除两三章中的某些地方外，我不会将自己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的意见强加于人。首先，我不想妨碍读者对各种事实作自由的理解；其次，重要的是鼓励人们独立自主地寻求真理，尤其因为真理总是具有深刻的个体特性。

真理问题，一般说来相当复杂，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。不过我应当就此讲几句话。

在追踪名人之死时，我遇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某个历史事件，往往一开始便被误传，不可靠的叙述使它在人们脑中生了根。几个世纪之后，某位喜欢追根究底的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，又会发现一些材料，确凿无疑地证明最初的说法大可怀疑。

有什么办法呢？

毫无办法！

人们的认识照例不会发生丝毫变化。或许这是对的。因为我们对一件事固有的解释早已习以为常，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来就是这么对待它的，它一直影响着历史、文化和人的认识，参与后来思维模式的形成。这样一来，虚假的解释、虚假的事实便成了真实，因为是这些东西在决定着我们的发展，而不是那些多年之后被揭示的、确切的事实。一个典型的例子（至少对俄国读者来说是如此）是莫扎特和萨利里的瓜葛^①。无论人们想怎样向我们证明杀害莫扎特的凶手不是萨利里，而是莫扎特的一位学生——莫扎特曾同他的妻子调情——可在我们看来，杀害这位音乐天才的凶手反正非萨利里莫属。

^① 安东尼奥·萨利里（1750～1825年），意大利作曲家，1766年起定居维也纳，一生创作过许多歌剧。贝多芬、舒伯特、李斯特都是他的学生。普希金曾利用他毒杀莫扎特的传闻创作了《一场小悲剧》、《莫扎特与萨利里》等剧作。

普希金的悲剧《莫扎特与萨利里》武断地肯定了关于莫扎特之死的“正统”说法，要从人们的记忆中，从文学的模式中，把这种无可辩驳的“经典”说法一笔勾销，压根儿就是不可能的。

其实，这些论断的形成仅仅属于历史范畴，而与准确的科学毫不相干。在科学面前，千百年的谬见会得到澄清，这虽然痛苦，但却是不可避免的。确实，这时我们不知为什么却没有想过有朝一日现代理论也会消亡，因为它们是在宇宙间并不充分、并不完备的基础之上的。然而人们就是如此，他们必定要求获得最终真相，而且要直接在此地、此时、此刻获得。

有一种研究死亡的专门学科——死亡学。不过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相当狭窄，基本上是从生物学和医学的角度来研究。然而，死亡与生命本身一样，是一个综合的、系统的现象。（附带要说的是，不知为什么没有一种从总体上研究生命的科学——生机学）。所以我们才有权来谈论全面死亡这一特殊现象的必要性。

我只举出几个“老大难”问题，它们把死亡这个题目塞得满满的，犹如一只蜂巢：

人的死期是不是命中注定的？如果是命中注定的，是否可以预测？

为什么有些正常人沦为杀人犯？

能否用科学方法证明灵魂是不死的？

如果存在上帝，为什么他容许无辜的儿童死亡？（这个问题出自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）

有无希望使人的躯体不朽？

诸如此类。

每一个问题都比蜜蜂把人扎得更痛。而且我们压根儿就别指望，会有甜言蜜语的回答来使我们内心的痛苦得到补偿。

而且，这些“老大难”问题能得到准确的回答吗？爱因斯坦曾说过：“我们努力认识世界，其实质，一是全面获取众多而复杂的人类经验，二是言简意赅地将它们表述清楚。我确信这两者可以得兼，或许——由于我们的科学知识尚很肤浅——这仅仅还是一个信念问

题。如果没有这个信念，我就不可能对钻研的独立价值坚信不疑”。

或许我并没有爱因斯坦那样的自信，不过仍然与他相同的是，很赞成对认识的自身价值的想法。可能柏拉图是对的：思想比我们的意识更为不朽，即便人类在这个被称作地球的行星上消逝得无影无踪，思想仍将在世界的空中震响。所以，我们的大胆设想，我们从诸神手中夺取圣火的企图，我们从认识之树上摘食禁果的愿望，并不是人们在想入非非，而是一个伟大的生活法则。对现实生活中新思想的理解的努力追求，过去和将来都是存在的，它并不以在人类自身进化过程中具有何种意义为转移，哪怕这种知识对人们将产生致命的危险，对认识的渴求也会在这种危险面前战胜恐惧感。所以，知识和思想比死亡更加强大。我因此才撰写这本书，你们也因此才阅读这本书。

诗人尼古拉·奥列伊尼科夫曾经写道：

生活吧，亲爱的，生活吧，杰出的人……

我们都将死去。

即使我未亡故，也将走向您的墓地。

作为对死亡应当抱有的态度，这是一个光辉的范例！死亡是一种客观现实，也应该把它当作客观现实加以对待。其他种种想法，都是多此一举。

A·拉夫林

第一章 “骇人听闻”的数字 和 20 世纪纪实大观

管窥蠡测看世界，
二十世纪非寻常！
历史学家不胜喜，
同代百姓愁断肠。

——尼·格拉兹科夫

一切威胁性命之物，
对于寻死者
都隐含着无以名状的愉悦……

——亚·普希金

我们这个世界

时代不能选择，
生死都在其间……

与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，并未思考过为什么我们恰恰生活在 20 世纪。而且，如果我们有选择的余地，则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想移居的并不是美国或澳大利亚，而是别的时代。据我所知，还没有任何人对这一点作过严肃的社会学调查。不过我想，20 世纪的爱国者及其反对者们都会取得一个共识，即我们这个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多事的一个世纪。这一点不难证明，只要透过“致命”的统计去浏览一下 20 世纪，就可以一目了然。然而，我们只能鼓起勇气，着手工作。

死亡总计

根据各国不同评估，全世界每年的死亡人数在 5000 万至 5500 万之间。按联合国截至 1991 年初的资料，发达国家每年死亡 1170 万人，其中 75 万人为横死（包括公路运输事故），13 万人自杀，其余的则死于各种疾病。俄罗斯 1990 年死亡人数为 1,655,993 人。

世界上最有生命危险的职业

在非军事性职业中，一般认为矿工是最危险的，这可以找出许多证明。1989 年 11 月，塞尔维亚一座煤矿发生爆炸，造成 90 人死亡；1990 年 8 月，同样的爆炸使 178 名南斯拉夫矿工在地下 500 米深处遇难。

美国现在每年死亡矿工 60~70 人，较之 80 年代初，几乎减少了一半。

在前苏联，1989年死亡矿工400多人，1990年约为500人。仅1990年的9个月内，便发生了23次爆炸事件和沼气燃烧事件，10次煤层、岩石坍塌和瓦斯突喷事件，38次矿井阻塞事件和114次井下起火。在最大的煤矿区顿巴斯，井下平均每开采100万吨煤便有一名矿工死亡。1991年6月29日，这里传出又一次悲惨的消息，南顿巴斯1号矿井发生火灾，夺去32名矿工的生命。1991年11月12日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死亡事件。在前苏联卡拉干达州卡拉巴斯基露天煤矿，在矿段内往一个钻孔里填装火药时，药料意外爆炸，两名钻工死亡。同一天，顿涅茨克附近的罗瑟普尼扬斯卡雅矿井，因联合采煤机下降时缆绳断裂，一名矿长、一名技师和两名矿井支架工罹难。这一天，对于共青矿（“诺里尔斯克镍业”康采恩）的两名工人来说，也是悲剧性的日子。他们试图乘坐制动失灵的车辆通过斜井；发动机熄火之际，不幸事件骤然发生。一名工人受到多处严重创伤，另一名工人死亡。

前苏联矿工的平均寿命仅为49岁。

按国际统计界的看法，危险性居第二位的职业是记者。许多人对英国记者法扎特·巴佐夫特事件记忆犹新，他无辜被指责从事间谍活动，于1989年在伊拉克被处死。根据社会组织“自由社”的资料，1987年有32名不同国家的记者被害。据法国“世界记者”协会的资料，1988年被害者已增加到45人，1989年则为70人。这70人中，15人死于哥伦比亚，11人死于萨尔瓦多，7人死于秘鲁，4人死于巴西。

据“自由社”的资料，1990年遇难记者数为43人，“世界记者”协会的统计数要少些，为36人。从1969年到1990年，按该协会的统计，全世界遇难记者总人数为751人。不过，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的“记者安全与保护”国际会议却公布了另一个数字：20年中遇难记者人数为830人（其中500多人死于拉丁美洲）。这一时期，对记者最危险的地方是菲律宾、哥伦比亚和巴基斯坦。例如，在1984~1990年间，哥伦比亚就有33名记者被害。1991年，这一堪忧的状况仍持续不衰。记者卡洛斯·罗德里格斯和阿塞·门德斯

又被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。他们是5月20日晨在弗洛伦西亚市前往广播节目制作处时被击毙的。这两名记者早些时候不止一次接到威胁电话，因为他们针对卡克塔省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撰写了批评性的文章。

在此3天之前，权威性日报《泰叻报》的主任记者维杜恩·卡瓦纳尼克在泰国首都曼谷被枪杀。他与那两位哥伦比亚的记者一样，受到各种权威人士的恐吓。他们要求这位记者停止撰写揭露文章，但记者对这些威胁未予理会。最后，这些对手用子弹来解决问题。

记者们总是勇于赴汤蹈火，战争对他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。10年越战打死145名记者，另有19人失踪。海湾战争夺去4名记者的生命。南斯拉夫克、塞两族内战刚刚打响，电视、报刊记者即频频遇难。记者皮埃尔·布朗舍被地雷炸死，埃贡·斯科特兰被枪手击毙，丹麦人埃尔文·凡·德·马斯特在老格拉季什卡村附近的乡村公路上被打死……仅仅3个月的战争中，就死亡21名记者，另有两人失踪。而据各个权利保障组织的资料，1991年全世界死亡的记者人数在66人至72人之间。

前苏联的改革所赋予的言论自由，给记者们带来了冒险的因素。1991年1月，在前苏联各共和国中，记者遇难的可悲记录始于导演Ю·波德尼耶克斯摄制组中的摄像师遇害一事。就在这个月，报界有两名同仁也惨遭不测：一为卡卢加州《旗帜报》编辑伊万·福明，一为《阿塞拜疆青年报》记者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省的萨拉藤·阿斯克罗瓦。在该省1991年的冲突中，共牺牲5名记者。这一年最后一名牺牲者是灯塔电视台的记者列奥尼德·拉扎列维奇，他于12月27日在斯捷巴纳克尔特附近被打死。

固然，矿工和记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，不过据我看，最危险的职业还是出任国家领导人（国王、总统、总理等）。我当然不是指绝对数字，而是指担任此项职务的人数同死亡人数的比例。作为实例，我这里列出一个名单，对于20世纪（在任上或离职之后一段时间）死于非命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来说，这个名单是远非完整的。

夸西·阿库富，加纳总统，死刑。

亚历山大一世，南斯拉夫国王，遇刺。

萨尔瓦多·阿连德，智利总统，遇刺。^①

哈菲祖拉·阿明，阿富汗总统，遇刺。

约恩·安东尼斯库，罗马尼亚独裁者，死刑。

卡斯蒂略·阿马斯，危地马拉总统，遇刺。

伊格内修斯·阿昌庞，将军，加纳前总统，死刑。

奥图尼奥·雷内·巴里恩托斯，玻利维亚总统，空难。

穆罕默德·贾瓦德·巴霍纳尔，伊朗总理，遇刺。

沙普尔·巴赫蒂亚尔，伊朗前总理，遇刺。

莫里斯·比晓普，格林纳达总理，遇刺。

佐勒菲卡尔·阿里·布托，巴基斯坦总理，死刑。

马约尔·瓜尔维托·比利亚罗埃尔，玻利维亚总理，遇刺。

英迪拉·甘地，印度总理，遇刺。

拉吉夫·甘地，印度前总理，被恐怖分子刺杀。

穆罕默德·达乌德，阿富汗总统，遇刺。

哈尔波·K·德尔加多，委内瑞拉总统，遇刺。

萨缪尔·道，利比里亚总统，死于权力斗争。

吴庭艳，南越总统，遇刺。

巴希尔·杰巴耶勒，黎巴嫩共和国总统，遇刺。

犬养毅，日本首相，死于未遂军事政变。

穆罕默德·加齐，(伊拉克)库尔德共和国总统，死刑。

拉希德·卡拉米，黎巴嫩共和国总理，遇刺。

卡卢什一世，葡萄牙国王，遇刺。

约翰·肯尼迪，美国总统，遇刺。

帕特里斯·卢蒙巴，刚果(现扎伊尔)前总理，遇刺。

威廉·麦金利，美国总统，遇刺。

亚德兰·门德内斯，土耳其总理，死刑。

① 另一种说法系自杀。(原注)

勒内·穆阿瓦德，黎巴嫩共和国总统，遇刺。

贝尼托·墨索里尼，意大利独裁者，死刑。

穆罕默德·拉基尔—沙赫，阿富汗国王，遇刺。

伊姆勒·纳吉，匈牙利总统，死刑。

尼古拉二世，俄国皇帝，遇刺。

朴正熙，韩国总统，谋杀。

奥洛夫·帕尔梅，瑞典首相，遇刺。

穆罕默德·阿里·拉贾伊，伊朗总统，遇刺。

齐亚·拉赫曼，孟加拉国总统，被叛乱分子杀死。

何塞·安东尼奥·雷蒙，巴拿马总统，遇刺。

哈维·罗利多斯，厄瓜多尔总统，空难。

安瓦尔·萨达特，埃及总统，遇刺。

斋藤实，日本前首相，海军上将，死于未遂军事政变。

赛义德·努里，伊拉克总理，在 1958 年革命中被杀。

安纳斯塔西奥·索莫查·加西亚，尼加拉瓜总统，在谋杀事件中受致命伤。

彼得·斯托雷平，俄国总理，在谋杀事件中受致命伤。

巴沙·塔拉特，土耳其苏丹宰相，被谋杀。

穆罕默德·塔拉基，阿富汗总统，死于权力斗争。

威廉·里查德·托尔伯特，利比里亚总统，遇刺。

胡安·何塞·托雷斯，波利维亚总统，遇刺。

埃雷拉·托里霍斯，巴拿马前政府首脑，空难。

拉菲尔·特鲁西略，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，遇刺。

翁贝托一世，意大利国王，死于恐怖分子之手。

费萨尔，沙特阿拉伯国王，遇刺。

浜口雄幸，日本首相，被恐怖分子伤害死亡。

尼古拉·齐奥塞斯库，罗马尼亚总统，死刑。

尼哈特·埃里姆，土耳其前总理，遇刺。

我要再一次强调，这仅仅是 20 世纪的记录！如果把时间再往前

推移，遇刺领导人的名单即使不占去几百页，也会占去几十页。我们仅以俄国和法国两个国家为例。俄罗斯的统治者们（大公和沙皇）情况到底怎样呢？伊戈尔·留里科维奇被德列夫利安人杀死，斯维亚托斯拉夫·伊戈列维奇被贝彻涅格人杀死，雅罗波尔克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在罗坚被杀，伊贾斯拉夫·雅罗斯拉维奇被波罗维茨人杀死，安德烈·博戈柳布斯基在博戈柳博沃被杀，尤里·弗谢沃洛多维奇在同拔都的战争中被打死，米哈伊尔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·特维尔斯科伊在奥廖尔被杀，尤里·丹尼洛维奇·莫斯科夫斯基被鞑靼人杀死。这还是些大公们。随着沙皇封号的出现，沙皇也开始一个个被杀掉。由于争权夺位而死于非命的有：伪德米特里一世、约安·安东诺维奇、彼得三世、保罗一世……最后，亚历山大二世和尼古拉二世也成了革命者手上的牺牲品。如此一来，沙俄帝国的50位执政者中便有14人被杀！此外，历史学家们还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，即鲍里斯·戈东诺夫是遭毒杀的，尼古拉一世也死于自尽。有关列宁和斯大林被毒杀的说法也时有耳闻。即使只列出确凿无疑的事件也可得出结论，俄国统治者中横死者竟占28%。难道还有其他什么职业的非自然死亡率会有如此之高？^①

法国的情况并不比俄国更好。在这个国家，遇刺或处死的君主有亨利三世、亨利四世、路易十六^②。这里我还得加上法国国民公会（即国会）的领袖人物，他们共计76人，其中18人上了断头台，3人自杀身亡。

瑞士历史学家菲利克斯·奥埃尔作过论断：在欧洲史中，英勇

① 当然，对于国家领导人横死的反应通常是各不相同的。很少人为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掉眼泪。但是，在得知约翰·肯尼迪遇刺后，有53%的美国人泣不成声。瑞典首相奥洛夫·帕尔梅遇刺后，有25%的瑞典人和44%当时住在瑞典的外国人痛哭流涕。（原注）

② 除此而外，路易九世国王在往突尼斯的十字军东征时死于鼠疫。还须提及的是，过去的情况与现在不同，君主常常在战争中阵亡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4世纪捷克国王扬·卢森堡斯基。他把国家交给他的代理人管理，自己却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战争。在1346年克雷西战役中，他站在法国一边，最终战死沙场。（原注）

的财政大臣比起君主和其他领袖人物来，死亡人数要多得多。根据奥埃尔的资料，法国英勇的财政家人数最多：从1315年到1781年，计有37名财政大臣惨死。

再谈一点当代最危险职业的情况。

这里有几份前苏联因职业原因造成死亡的资料。在前苏联煤气工业中，1988年死亡55人，1990年为38人。在冶金工业中，1989年死亡14人，1990年为19人。1990年在工业部门和原子能部门中共计死亡1,000人以上。如果将整个生产部门列出，则数字更加可怕：例如，1989年在生产过程中造成14,475人死亡（恰好等于10年阿富汗战争中前苏军的死亡人数）。1990年，前苏联在生产过程中死亡的人数达到16,000人，这就是说，每天发生的不幸死亡事件在40起以上。

在某些国家，由于政治局势的原因，一些职业骤然变得特别危险。在北爱尔兰，由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对立情绪加剧，出租车司机大遭厄运。出租车通常应当是挂公司标志，但这种标志却立刻显露了司机所隶属的这个或那个阵营，促使暴力事件发生。1990年10月便有一名属新教徒一派的司机被打死，当时他正运载一个儿童经天主教徒控制的马路去一家医院。几天后，又发现一名天主教徒一派的司机在他的车中被打死并烧焦。在这种情势下，被打死的不仅有出租车司机，同时也有乘客。7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震惊全国的“桑吉尔凶杀事件”，一群暴徒在汽车上将几名天主教徒骗往新教徒的街区，在那里将他们杀害。

1990年11月，以色列一名犹太人出租车司机被打死，目的是报复21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被杀。1990年，莫斯科有4名出租车司机遇害。其中一人在夜里去卖伏特加，打死他的原因是他的酒价太高；另一人是被警察在非公务时间里打死的，因为他拒绝将这名警察送到指定地点。1991年和1992年，莫斯科有两名出租车司机在遭抢劫时被打死。

因维持社会治安而牺牲的人也不少。1988年，前苏联民警有263人牺牲，1989年则为345人。美国警方也不时有人牺牲，只是人数